

錢穆

钱穆作品系列



朱子学提纲

朱子学提



钱穆作品系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子学提纲/钱穆著. -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2002.8 (2002.10重印) (2005.4重印)
(2006.9重印)

(钱穆作品系列)

ISBN 7-108-01718-0

I. 朱… II. 钱… III. 朱熹(1130~1200)-哲
学思想-研究 IV. B244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26867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
封面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	100010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2年8月北京第1版 2005年4月北京第2版 2006年9月北京第4次印刷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7.375
字 数	135千字 图字 01-2002-1301
印 数	25,001-30,000册
定 价	16.50元

弁 言

余自1964年夏,发意撰写《朱子新学案》。迄于69年11月,全稿告竣。因念牵涉太广,篇幅过巨,于70年初夏特撰《提纲》一篇,撮述书中要旨,并推广及于全部中国学术史。上自孔子,下迄清末,二千五百年中之儒学流变,旁及百家众说之杂出,以见朱子学术承先启后之意义价值所在。若未能读余新学案全书,窥此一篇,亦可约略得其宗趣。若求进窥全书,亦必以此篇为嚆矢也。1971年,新学案全书出版,因续将提纲分别单行,以便读者。

钱 穆

1971年11月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

目 录

弁言 1

朱子学提纲 1

- (一) 孔子与朱子 1
- (二) 先秦儒至汉儒的流变 3
- (三) 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 5
- (四) 宋之新儒 8
- (五) 宋代之理学 13
- (六) 朱子为集儒学之大成者 21
- (七) 朱子之理气论 32
- (八) 朱子之心性论 41
- (九) 朱子论宇宙之仁 51
- (十) 朱子论宇宙之神 57
- (十一) 朱子之圣人难为论 65
- (十二) 朱子论人心之仁 69
- (十三) 朱子论心之诚 79
- (十四) 朱子之天理人欲论 85

- (十五) 朱子之道心人心论 90
- (十六) 朱子论敬 95
- (十七) 朱子论静 102
- (十八) 朱子论已发未发以及涵养省察 106
- (十九) 朱子论克己 110
- (二十) 朱子论立志 119
- (二十一) 朱子论格物 124
- (二十二) 朱子论象山 134
- (二十三) 朱子论禅学 142
- (二十四) 朱子论为学 150
- (二十五) 朱子论读书 155
- (二十六) 朱子之经学 163
- (二十七) 朱子之四书学 183
- (二十八) 朱子之史学 191
- (二十九) 朱子之文学 197
- (三十) 朱子之杂学 204
- (三十一) 朱子学之流行 213
- (三十二) 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218

* 原繁体字版无目录。此次出版简体字本，目录文字由三联书店编辑部酌加，置于书前，谨供读者参考。

朱子学提纲

拙著《朱子新学案》，分篇逾五十，全书超百万言，恐读者畏其繁猥，作此提纲，冠于书端，庶使进窥全书，易于寻究。

(一) 孔子与朱子

在中国历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朱子，此两人，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，留下莫大影响。旷观全史，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。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，开创儒学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。北宋理学兴起，乃儒学之重光。朱子崛起南宋，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，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。此两人，先后矗立，皆能汇纳群流，归之一趋。自有朱子，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，乃重获新生机，发挥新精神，直迄于今。

然儒学亦仅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主干，除儒学外，尚有百家众流，其崇孔尊孔，述朱阐朱者可勿论，其他百家众流，莫不欲自辟蹊径，另启途辙，而孔子朱子矗立中道，乃成为其他百家

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同抨击之目标。故此两人，实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，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。不仅治儒学者，必先注意此两人，即治其他百家众流之学，亦必注意此两人，乃能如网在纲，如裘在领。不仅正反之兼尽，亦得全体之通贯。

孔子年代，距今已远，其成学经过，已难详索。后之崇孔尊孔者，亦惟以高山仰止之情，发为天纵大圣之叹而止。朱子距今仅逾八百年，书籍文字可资稽考者尚多，凡朱子之所以为朱子，其成学之经过，实可按图索骥，分年历述。故治朱子之学，比较可以具体而详尽，并亦有据而可证。学者潜心于此，可识儒学进修之阶梯，虽不能举一以概全，要之是典型之尚在，其所裨益，决非浅小。

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，述之阐之者既多，反之攻之者亦众，事久而论定，故孔子之学，乃虽远而益彰。朱子距今仅八百年，后人之阐发容未能尽。而反朱攻朱者，多不出于百家众流，而转多出于儒学之同门。盖自有朱子，而儒学益臻光昌。自有朱子，而儒学几成独尊。于是于儒学中，与朱子持异见者乃日起而无穷。群言淆乱，所争益微，剖解益难。故居今日而言朱子学，尚有使人不易骤获定论之憾。尊孔崇孔，乃朱子以后中国学术上一大趋向，而述朱阐朱，则尚是中国学术上一大争议。然净朱攻朱，其说亦全从朱子学说中来。今果于朱子原书，能悉心寻求，详加发明，先泯门户之见，而务以发现真相为主。逮于真相既白，则述朱阐朱之与净朱攻朱，正反双方，宜可得一折衷，

由是乃可有渐得定论之望。此则不仅为治中国八百年来之学术思想史者一重大课题,实亦为治中国两千年来之儒学史者一重大课题。凡属关心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此一主要骨干之精神所在,大旨所寄者,对于此一课题,皆当注意。作者不揣简陋,发愤为此书,其主要意义亦在此。

(二) 先秦儒至汉儒的流变

今当自孔子以后迄于朱子,此一千七百年来之儒学流变,与夫百家众说之杂出,先作一概括之叙述。

自孔子歿后,孔门诸大弟子,分散列国,相与传扬孔子之道,其时儒学基础已奠定。然同时反对孔子与儒学者,亦即踵起。最著者有杨墨,孟子辞而辟之,廓如也。然百家众流,亦即继之竞兴,至荀子而有《非十二子》之篇。其所反对,不仅百家众流,即子思孟子亦在其列。当时称儒分为八,然惟孟荀称大宗。

及秦人一统,始皇帝颇尚法家言。汉兴,黄老道家寝盛。其时则战国时代之百家众流,渐趋消失,惟儒道法三家鼎峙成三,然儒家言犹尚若居道法两家之后。至汉武帝表彰六经,罢黜百家,而儒学跻于独盛。然此下汉儒之学,毕竟与先秦儒有区别。此种区别,大体由于双方所处时代背景不同而引生。

战国时代,列强纷争,天下未定,百家竞起,各欲揭其主张以为一世之蕲向。先秦儒为自身争存,亦相务于树新义,肆博

辨。故其贡献，主要在理想方面者为多。汉代统一，局面大变，当时主要论点，在为此天下求实际之治平。汉初君臣，来自田间，本身初无学术修养，然深知民间疾苦，极欲与民休息，而道家清静无为之说，遂乘时兴起。然无为而治，事不可久，抑且无为即是不治，故汉初政治，实乃一依秦旧，承续法治之轨辙。及至武帝临朝，董仲舒对策，力言复古更化，复古乃复周之古，更化则更秦之化。周代绵历八百年，秦则不二世而亡，此乃历史教训，明白彰著。此下汉儒一般意向，均重在本历史，言治道。欲法周，则必上本之于六艺经典。当时谓六经起自周公而成于孔子之手，故曰孔子为汉制法。尊孔子，乃由于尊周治。尊周治，则必尊周公，尊六艺。故汉武帝兴太学，立五经博士，专以六艺设教，而《论语》乃与《孝经》《尔雅》并列为小学书。《尔雅》乃五经之字典，而《孝经》《论语》则仅是小学教本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上承刘向歆父子，分群书为七略。首六艺略，次诸子略，儒家者言居诸子略之首，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属之。而孔子不与焉。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则同附六艺略之后，此乃汉儒心目中的学术分野，亦可谓汉儒尊经尤重于尊儒。史汉儒林传中序列诸儒，皆起汉初，而曾思孟荀亦不预。此乃一代之新儒，以传经言治为业，与战国诸儒之以明道作人为唱者，畸轻畸重之间有不同。此一区别，首当明辨。换言之，先秦儒在汉儒心目中，亦属百家言。汉儒传经，乃即所谓王官之学，一则主张于朝廷，一则兴起于田野，其为不同，显然可知。

汉儒固若无伟大特创之政治理想，亦若无伟大杰出之政治

人物，然而定法制，垂规模，坐而言，即继以起而行。两汉郅治，永为后世称羨而效法。汉儒之功，要为不可否认。

汉儒言治道，必本之于经术，而经籍之整理，事亦不易。先秦儒如孟子荀卿，虽亦时时称引诗书，然仅止于随所意欲而加称引，非求于经籍有通体之发挥。秦火以后，经籍残缺。汉儒治经之功，一则曰纂辑，再则曰训诂，又后有章句，始于全经逐章逐句，一一解释。其间容多未是，又复各家之说不同，未能会归一致。然而汉儒治经之功，亦要为不可没。

今再综合言之，汉儒之为功于当时者，一为治道之实绩，一为传经之专业。又复渐分两途，一则专务治术，一则专守经业。迄于东汉季世，朝政不纲，治道日替，务于治术之儒，日失其职，而专一经业之儒，退处在野，乃大为一世所仰重。如许慎马融郑玄诸人，亦永为后世治经之宗师。然若谓汉儒功在传经，而忽其言治，则终为得其一而失其一，无当于汉儒之大全。

（三）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

三国两晋时代，天下分崩，两汉统一隆盛之世，渺不复接。时则庄老道家言乃与儒生经学代兴。又值佛教东来，其先尚是道家言在上，佛家言在下。南北朝以后，则地位互易，释家转踞道家之上。儒家经学，虽尚不绝如缕，要之如鼎三足，惟儒家一足为最弱。

若专言儒业，自东晋五胡以下，南方儒亦与北方儒有区别。

大体言之，东晋南朝虽属偏安，其政府体制，朝廷规模，尚是承袭两汉，大格局尚在。而释道盛行，门第专擅，治道无可言，故其时之南方儒，只有沿袭汉儒传经一业，抱残守缺而止。北方自五胡云扰，下迄北魏建统，两汉以来之政府体制，朝廷规模，已扫地而尽。故其至要急务，厥在求治。幸而胡汉合作，政府尚知重用儒生，而北方诸儒，其所用心，言治道更重于言经术。亦可谓其时北方儒生，多半沿袭了汉儒重治绩之一边。自魏孝文变法下至西魏北周崛起，政治开新，皆出北方儒生之贡献。

然则南北朝儒，乃是分承汉儒之两面，而各作歧途之发展。下迄唐代开国，两汉统一盛运再见，孔颖达奉诏撰《五经正义》，即承汉儒及南朝诸儒治经一业而来，此为经学成绩之一大结集。而贞观一朝言治，即就其荟粹于《贞观政要》一书者而言，亦可谓多属粹然儒家之言，此乃上承汉儒及北朝诸儒言治一业而来。此后唐代儒家，在治道实绩方面，尚能持续有表现。在经学方面，则可谓自《五经正义》后即绝少嗣响。唐代经学之衰，实尚远较两晋南北朝为甚。此中亦有原因可说。

一则下至唐代，虽仍是儒释道三足并峙，而实际上，佛教已成一枝独秀。远自隋代以来，已有所谓中国佛教之兴起。此指天台华严禅三宗。而自武后以后，禅宗尤盛，几于掩胁天下，尽归禅门之下。士大夫寻求人生真理，奉为举世为人之最大宗主，与夫最后归宿者，几乎惟禅是主。至其从事治道实绩，则仅属私人之功名，尘世之俗业。在唐代人观念中，从事政治，实远不如汉儒所想之崇高而伟大。汉儒一心所尊，曰周公，曰孔子，

六经远有其崇高之地位。唐代人心之所尊向，非释迦，则禅宗诸祖师。周公孔子，转退属次一等，则经学又何从而获盛。

次则唐代人之进身仕途，经学地位亦远不如文学地位之高。欲求出身，唐代之文选学，已接代了两汉之六艺学。唐代人无能吟诗，但绝少能通经。在诗人中，亦可分儒释道三派。如谓杜甫是儒家，则李白是道家，王维是释家。依此分类，唐诗人中，惟儒家为最少。文选诗中，亦最少儒家诗。陶渊明乃是鹤立鸡群，卓尔不凡。而其诗人文选者亦特少。故就唐一代言，可谓无醇儒，亦无大儒。

——就唐代言儒家，则必屈指首数及韩愈，然韩愈已在唐之中叶。韩愈尽力辟佛，极尊孟子，乃是一议论儒，近似战国先秦儒，而较远于汉儒。韩愈又提倡古文，求以超出于文选学之外。此亦为在当时欲致力复兴儒学一必然之要道。但韩愈用力虽大，收效则微。在政治上提挈韩愈为韩愈所追随之裴度，乃唐代一贤相，然其人亦信佛。与韩愈共同提倡古文者有柳宗元，然宗元亦信佛。追随韩愈从事古文运动者有李翱，作《复性书》三篇，根据《中庸》，重阐儒义，然其文亦复浸染于佛学。韩李身后，古文运动亦告停息，儒学复兴运动，则更可不论。

故通论有唐一代，儒学最为衰微，不仅不能比两汉，并亦不能比两晋南北朝。其开国时代之一番儒业，乃自周隋两代培植而来。其经学成绩，亦是东汉以下迄于隋代诸儒之成绩。唐初诸儒只加以一番之结集而已。唐代士大夫立身处世，所以仍不失儒家架夔者，乃从以前门第传统中来。远自东汉直至唐代，

大门第迭起,实尚保有儒家相传修身治家之风范与规格。自唐中晚之际,大门第相继崩溃,此种规格与风范,渐已不复存在。其时社会上乃只充斥着诗人与佛教信徒。佛教信徒终不免带有出世性,诗人则终不免带有浪漫性,于是光明灿烂盛极一时之大唐时代终不免于没落,而且没落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五代在中国史上乃成为一段最黑暗时期。其时则真所谓天地闭,贤人隐,远不能比东汉以下之三国两晋。三国两晋时代虽乱,却有人物。从其人物群兴之一方面说,三国两晋却差可与战国相比。有了人,纵是乱,后面还可有希望。乱到没有了人,人物等第远远地降退,此下便无希望可言。五代亦有人物,则全在禅门之下。

(四) 宋之新儒

下及宋儒,便使人易于联想到理学,理学则后人称为是一种新儒学。其实理学在宋儒中亦属后起。理学兴起以前,已先有一大批宋儒,此一大批宋儒,早可称为是新儒。在某一意义上讲,理学兴起以前之宋儒,已与汉儒有不同。比较上,此一大批宋儒,可称为已具有回复到先秦儒的风气与魄力。

宋代虽亦称是统一时代,但宋代开国,北有辽,西有夏,并不曾有真统一。而且上承五代传下一派黑暗衰颓气象,因此宋代开国,绝不能和汉唐相比。汉唐诸儒,大体言之,似乎多怀有一番处在升平世的心情。宋代开国六七十年,儒运方起,当时

诸儒所怀抱，似乎还脱不了一番拨乱世的心情。言外患，则辽夏并峙。言内忧，则积贫积弱，兵制财制，均待改革。而政府大体制，朝廷大规模，仍亦沿袭五代，初未有一番从头整顿。言社会文化风教，则依然是禅宗佛学，与夫骈四俪六之文章当道得势。宋儒处在此种形势下，不啻四面楚歌，因此其心情极刺激，不似汉唐儒之安和。而其学术门径，则转极开阔，能向多方面发展，不如汉唐儒之单纯。分析宋儒学术，当分几方面加以叙述。

一是政事治平之学。宋儒多能议政，又能从大处着眼。最著者，如范仲淹之十事疏，王安石之万言书，引起了庆历熙宁两番大变法。在汉唐儒中，惟汉初贾谊之陈政事疏，与夫董仲舒之天人对策，差堪媲美。惟贾董两文，开出了汉代儒家政治之新气运。而庆历熙宁变法，则转增纷扰，反而因此引起混乱局面，而北宋亦随之以亡。此乃由环境遗传种种因素相逼至此，不得怪范王对政事之无所见。其他诸儒，能议政，能从大处着眼，能阐申儒义，难于一一缕举。

其次曰经史之学，此与政事治平之学相表里。宋儒经学，与汉儒经学有不同。汉儒多尚专经讲习，纂辑训诂，着意所重，只在书本文字上。所谓通经致用，亦仅是因于政事，而牵引经义，初未能于大经大法有建树。宋儒经学，则多能于每一经之大义上发挥。尤著者，如胡瑗苏湖设教，分立经义治事两斋。经义即所以治事，治事必本于经义，此亦汉儒通经致用之意，而较之汉儒，意义更明切，气魄更宏大。神宗尝问胡瑗高弟刘彝，

胡瑗与王安石孰优。刘彝对曰：

臣师胡瑗，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，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。臣闻圣人之道，有体，有用，有文。君臣父子仁义礼乐，历世不可变者，其体也。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，其文也。举而措之天下，能润泽斯民，归于皇极者，其用也。国家累朝取士，不以体用为本，而尚声律浮华之词，是以风俗偷薄。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，尤病其失，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，夙夜勤瘁，二十余年，专切学校，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，皆臣师之功，非安石比也。

此虽刘彝一人称崇其师之辞，然即谓此种精神，乃是北宋诸儒间之共同精神，亦无不可。胡瑗则当可推为乃倡导此种精神之第一人。

论北宋诸儒之治经，如胡瑗之于《易》与《洪范》，孙复之于《春秋》，李觏之于《周官》，此等皆元气磅礴，务大体，发新义，不规规于训诂章句，不得复以经儒经生目之。孙复书名《春秋尊王发微》，李觏书名《周礼致太平论》，即观其书名，亦可想见其治经意向之所在。其他如欧阳修刘敞王安石苏轼诸人，皆研穷经术，尚兼通，而亦皆喜辟新径，创新解，立新义，与汉儒治经风规大异，此亦北宋诸儒近似先秦儒气之一征。

论及史学，尤其是宋儒之擅场。如欧阳修之《五代史》《唐

史》、司马光之《资治通鉴》，皆其荦荦大者。其他如苏辙之于古史，刘攽之于汉史，范祖禹之于唐史，刘恕之于上古及五代史，就一般而论，宋儒史学，显较汉唐儒为盛。而宋儒之于史学，亦好创立议论，不专于纂辑叙述考订而止。于著史考史外，特长论史，此亦宋代学术一新风气之特征。

又其次曰文章子集之学，此乃承唐韩愈之古文运动而来。远在五代，已有僧人在寺院内教佛徒读韩集。盖儒学既燿，治道大坏，一世不得安，虽寺院僧人，亦不能自外。故有寺院僧人提倡攻读韩集之事之出现，此诚大堪诧异，亦大值惊惕，而宋代学风将变，亦可据此而窥其端倪之已露，机缘之已熟。自欧阳修以下，古文大行。王安石苏轼曾巩尤为一代巨匠。宋诗亦与唐诗风格相异。而其时朝廷官式文章，则仍以四六为标准。虽欧阳王苏诸人，亦皆默尔遵守，独司马光为翰林学士，以不能为四六辞。神宗强之曰，如两汉制诏可也。世风之猝难骤革，即此可见。今专就文学论，汉代文学在辞赋，唐代文学在文选，皆在儒学范围之外。惟宋儒始绾文学与儒术而一之，此亦是宋儒一大贡献。

尤可注意者，乃北宋诸儒之多泛滥及于先秦之子部。即就儒家言，唐韩愈始提倡孟子，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，奉之入孔子庙。而同时如李觏之常语，司马光之疑孟，皆犹于孟子肆意反对。然自宋以下，始以孔孟并称，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，大异其趣。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，此风虽始于韩愈，而实成于宋儒。此当大书特书为之标出。